

“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学术研讨会综述

段 芳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422x(2019)02-0103-04

2018年11月2-4日,“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厦门举行。本次会议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办,厦门大学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闽商研究中心、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20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研讨会,大会共收到论文36篇。

会议开场由著名海洋史专家、厦门大学历史系杨国桢教授发表主旨演讲。杨教授首先强调海洋史研究要以海洋为本位,强化海洋意识。杨教授指出,在此指导思想下,厦门大学培养了一个海洋史研究博士生团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杨教授认为,当今海洋史研究也面临学科定位和建设的问题:当前国内的历史学学科划分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海洋史囿于中国史的专门史门类之下,其研究对象和内容因此受到限制。最后,他倡议海洋史工作者应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强化从海洋出发开展研究的意识,打通学科界限,也期待海洋史的学科定位得到提升、海洋史学研究有更好的发展。

会议研讨期间,与会学者就清代海疆危机及其应对、清代海疆制度与海防政策、清代海疆的开发与管理、清代海洋贸易与经济发展、清代海洋移民与人文交流、清代航海技术与海洋观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清王朝是一个经历世界局势大变动的朝

代,海疆危机从传统的海盗骚扰逐渐升级为国外殖民力量的威胁,清王朝海洋主权面临的挑战与清政府的应对等相关问题备受学者关注。刘平(复旦大学历史系)《从大盗首到命妇——郑一嫂的生命轨迹》通过搜集分析乾隆嘉庆时期活跃于华南沿海地区的红旗帮、黑旗帮等海盗资料,试图勾勒一个传奇大盗首郑一嫂的生命历程,从而还原海盗、疍家水上族群、洪门民间结社等曾对清王朝统治构成威胁力量的真实面貌。于逢春(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映照下的清朝之日本海与鄂霍次克海经营景况》考察了清朝经营与痛失库页岛及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的基本事实,认为日俄两国最终掌控日本海与鄂霍次克海是一种窃取行为。殷昭鲁(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近代东亚变局与中日“球案”交涉》梳理了中日“球案”始末及中日两国在此期间力量消长情况,从琉球问题、中日关系两方面阐述了中日琉球之争对近代两国关系和东亚格局的影响。刘璐璐(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反思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制海权问题》试图从制海权的层面重思中日甲午战争,认为日本通过效仿西方海权国家,积极主动争夺东北亚海域的制海权,有明确的作战目标。反观清朝当事者尤其是李鸿章,则缺乏争夺制海权的战略意识与执行力。

面对海疆危机的不断加深,清政府的最初反应即加强海防。海防是海疆政策的中心环节,海防政策依然是与会者重点关注与讨论的

[收稿日期]2019-03-08

话题。李细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东亚海域到东南海疆——明清之际台湾战略地位的演化》从世界史和中国史双重视角,通过长时段考察,梳理了明清之际台湾战略地位从东亚海域国际商贸转运站向东南海疆屏藩转变的历史脉络。潘洪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清代八旗水师与海防体系》论述了八旗水师的兴衰及其与国家海防的关系,并强调清朝政府有过以八旗为中心建立海防体系的构想与实践。王日根(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胡里山炮台的修建与晚清政治》从胡里山炮台的修建过程管窥晚清南北洋海防建设中的资源争夺、不同势力集团之间对自我官绩的重视、地方绅商对国家事务的责任分担,以及外国势力的渗透等诸多面相。翟金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甲午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办寿史实考辨》通过对甲午年慈禧太后办寿经费来源的考辨,厘清了办寿前后清廷海防建设计划、庆典工程经费来源、庆典结束后时局转化等基本史实,并借机考察了甲午战败的原因。

海疆政策与海疆开发实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政策与实践则存在明显差距,地方士绅、普通民众等民间力量则是导致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与会者围绕清代海疆的开发与管理进行了深入探讨。何国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释放生存——淇澳岛民对清廷政策的适应》采用人类学见微知著的方法,考察了珠江口淇澳岛民在清政府“迁界复界”政策和“英国鸦片轮船停留”事件冲击下,如何进行自我调试,释放生存压力。薛理禹(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清康熙时期东南沿海保甲规条研究》对康熙时期于成龙《弭盗安民条约》、张伯行《申饬乡约保甲示》比较分析,发现这一时期东南沿海保甲制度具有重视户口册籍的编纂、维护治安、强化奖惩机制及保甲管控等共性。覃寿伟(闽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院)《地方记忆与近代海疆危机——基于〈啸云诗文钞〉之述论》根据金门林树梅《啸云诗文钞》探讨了近代海疆危机处置、战争善后与官民关系等问题,展现了十九世纪中叶地方人士的海

洋、海防观念。肖丽红(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海疆社会治理困境影响闽讼处理——以清代中后期闽吏文集的“官累求卸”文字为中心的考察》通过深度剖析清代中后期闽吏文集中频繁出现的“穷而求卸”或“因病求卸”等抱怨文字,认为清代中后期福建地方官吏生存状态十分艰难,海疆社会治理面临诸多难题。陶仁义(厦门大学历史系)《盐场、镇城到县治——以庙湾为中心的明清苏北濒海社会发展考察》考察了庙湾地区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从盐场转型为镇城,最终于雍正年间成为新分县阜宁的县治所在,完成了由海洋经济向陆地经济的转型,展示了民间自发形成的生计模式与朝廷政策之间的响应与变通。

海洋贸易继续是海疆史研究的热点。以往,学者多认为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扼杀了海上贸易。但与会学者通过对清政府海洋贸易政策的仔细爬梳,认为其中不乏可陈之处。陈友义(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所)《清代前期潮汕与东南亚的红头船贸易》重点阐述了清前期潮汕与暹罗、安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红头船贸易,认为红头船贸易不仅活跃与繁荣了潮汕经济,亦推动了移民浪潮。李玉铭(上海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帆船时代:清代上海远洋贸易形态与结构——以上海与长崎远洋帆船贸易为中心》通过对清代至开埠前上海远洋帆船贸易的具体形态与结构的梳理与探讨,证明上海在近代以前已是较为重要的港口,对以往上海经济史研究中认为在鸦片战争前上海同国外的贸易关系是间接状态的说法提出了商榷。孙晓莹(深圳大学人文学院)《乾隆年间清政府对赴日贸易的管理——以范氏办铜为中心》通过中文档案和碑刻资料,着重分析了乾隆年间介休范氏赴日办铜原因、铜的单价及采购数量、办铜长期化、办铜的特点,对前人研究有所补充和修正。李尹(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乾隆年间沿海豆禁政策的松弛与北洋贸易的繁荣发展》分析了清代沿海贸易政策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从清初实施严厉的豆禁政策到康熙开海沿海豆粮贸易的初步发展,再到乾隆年间

沿海豆禁政策逐步松弛,最终使北洋贸易达到开埠前的空前繁荣。徐淑华(中国计量大学)《大航海时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浙江海商研究》在全球史视野下对浙江海商产生、发展的历程予以考察,并且与同时期东亚海域的欧洲海商加以比较,展现了浙江海商的曲折发展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及影响。王华锋(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冲突抑或媾和:乾嘉时期海盗与海商关系析论》对乾嘉时期海盗与海商关系进行了辨析,认为就海商而言,海盗既是海上贸易的威胁,又是对抗政府盘剥的结盟对象。就海盗而言,海商既是抢劫的主要对象,又是物资的重要来源。苏惠莘(闽南师范大学闽台文化研究所)《海洋史视野下的清代前期福建粮食供给问题》不同于以往关于清代前期福建粮食供给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官府的努力,该文强调了地方士绅、海商在官府政策导向下的因应之策,展现了民间力量在清代海疆开发中的探索和开拓。

海洋是一个动态的空间,而人口流动是其中最基础、最普遍的现象。伴随着海洋人口的流动,中国海疆不断拓展,文化交流日益增强。清代海洋移民与人文交流是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曾玲(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并非源自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神明:马来西亚拿督公崇拜的田野调查》利用在马来西亚拍摄与收集的各种拿督公神像、庙宇、神龛的照片及相关资料,以及在巴生、麻坡、吉隆坡、檳城、马六甲、新山等地进行口述访谈的田野调查资料,从文化移植与文化创造性发展的视角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拿督公神明及其崇拜形态、拿督公崇拜建构与运作、拿督公崇拜的护佑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考察,认为伴随华南移民而传播到东南亚的中华文化,并非简单的移植和空间上的延伸,而是结合东南亚当地资源重新建构与发展的另一种神明与信仰形态。郑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祖先与孤魂——芙蓉坡兴化人的中元普渡仪式》结合田野调查、访谈资料和相关文献,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普度为个案,考察芙蓉坡“福莆仙普度联谊社”的沿革、兴化人中元普度仪式的特征,分析了华南原乡的社会文化传

统如何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继承和再创造。李勇(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二战前东南亚华校国家认同形塑研究:以新加坡养正学校为例》运用新加坡华文报章及养正学校学生校刊等史料,以战前新加坡养正学校国家认同形塑为案例,探讨教育在国家认同形塑中的作用。冯国林(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韩国学界在韩华侨史研究的新进展》从华侨与政治外交、华侨与经济、华侨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重点阐述了2010年以来韩国学界华侨研究的新进展,指出了该课题需要提升的空间。

航海技术和海洋观念的进步有助于海洋的开发和强化清王朝对海洋的管理。本次会议对航海技术与海洋观念等议题亦给予了较多关注。在航海技术史方面,李智君(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明清中国东南沿海的风信理论与航海避风》以厦门湾为中心探讨了明清时期的风信理论及其科学性,并阐述了在风信理论指导下海上航行的避风措施。张侃(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从针路文献看南麂岛在明清航线上的指向功用及其变化》通过对针路簿、海道经、航海图等资料的梳理,发现南麂岛在航路上的指向功能存在叠加和嬗变现象。它既是明清中琉朝贡的回程首岛,又是清代海运航线的交叉节点,使得南麂岛及其周边形成了多重功能叠加的海洋空间。在海洋观念变迁史方面,王宏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清代福建内外洋考》通过大量史料及地图标注论证了福建沿海六府均按照朝廷旨意,严格划分了内洋与外洋,明确了水师官兵的水陆汛地。刘延华(中国南海研究院)《近代中国的南海海疆观》认为西方“领海”观念传入以后,由于无法容纳中国传统“海疆”实践,中国政府采用“领海”与“海疆”相结合的方式,兼顾东方传统惯例与西方通行规则,重新诠释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林蓁(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有关高升号的国际法问题》通过回溯甲午海战期间,被清政府租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在朝鲜丰岛附近海域被日本军舰击沉,而国际法专家却公开为日本辩护的相关史实,诠释了国际法在国家海洋政策以及对外交涉中的重要性。潘茹

红(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 《传统海洋图书的演变与发展——以明中叶至清中晚期为例》认为自郑和下西洋后,传统海洋图书的编撰呈现新的特点,并且传播方式渐趋多样化,透过对变动中传统海洋图书的研究与梳理,展现出明清沿海社会走向海洋、融入世界的观念转变进程。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除了对传统海疆史议题如海防政策、海洋贸易、海洋移民、海盗与海商等进行再探讨外,还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第一,进一步深入探讨清代海疆政策与海疆开发实践之间的差距,认为民间因素在海疆开发中的重要性值得充分展开;第二,清代海疆开发的地域除了以往探讨比较多的东南海域外,“东北亚海域”同样值得投入更大的精力;第三,提倡借鉴人类学、考古学、法学、气象学等其他学科知识和理论,形成合力,产生更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成果。

圆桌会议上,与会学者畅所欲言,气氛热烈。水海刚、肖丽红、李尹、覃寿伟、刘璐璐等青年学者就各分会场的报告和讨论情况做了汇报总结,向我们展现了新一代海疆史研究者的风采。荷兰籍历史学家、国际著名海外华人研究专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é) 对本次会议给予高度赞誉,他强调利用田野调查方法研究捕鱼、行船为生的水上人群的历史、私人海上贸易史等海疆史研究面向的重要性。与会者普遍认为,清政府在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时并未消极无为,而是不断探索海疆治理的可行性方略,因此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清代海疆政策的进步性及局限性。

闭幕式上,王日根教授对会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认为此次会议上形成的诸多共识,不仅对海疆史、海洋史、边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当下海疆管理、海权维护、“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